

# 《濂乡记》辑考

李玉诚

**提要：**崔玄山《濂乡记》，一卷，大约成书于北魏后期，时间上限为太昌元年（532）或北周宣政元年（578）以后，时间下限最晚为隋大业初年以前，可能散佚于南宋中后期，目前尚存大约20条遗文，3条相关内容，总计23条，主要集中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太上老君年谱要略》等书，南宋以后学者引用《濂乡记》之文，皆未超出以上诸书范围。《濂乡记》所录“李母碑”对研究六朝道教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对于解决酈道元《水经注》所载“李母冢碑”与《太平御览》卷1所录“王阜《老子圣母碑》”的关系，以及汉代道教史等问题，参考价值并不十分突出。

**关键词：**崔玄山 《濂乡记》 《李母碑》 《老子圣母碑》 《老子铭》

《濂乡记》作为中国早期地方志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方志学界历来受到重视；而其内容主要记载老子祠、李母祠的情况，涉及老子的神化问题，并且与王阜《老子圣母碑》《李母碑》《老子铭》有关，在道教史研究中亦颇受重视。目前较为全面的辑本见于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所辑10条<sup>①</sup>，但是仍有不少遗漏；《濂乡记》的成书年代、散佚年代问题依然存在较大分歧；《濂乡记》所录“李母碑”可能是一组而非仅是一碑；《濂乡记》存在一条遗文与《老子铭》基本雷同，对《老子铭》的断代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上诸多问题皆有待详考。

## 一 崔玄山《濂乡记》成书年代

崔玄山的生平事迹，史籍失载，自北宋开始有少数文献引作“崔元山”，宋人晁载之甚至引作“顾玄仙《濂乡记》”<sup>②</sup>，或为误书，但是综合各种文献的著录、引用情况来看，崔玄山、崔元山、顾玄仙应当系一人，以崔玄山之称最早、最为常见，特别是唐代引文皆作“崔玄山”，因此，其人名讳应当就是崔玄山。<sup>③</sup> 目前所见崔氏著述，似乎主要是《濂乡记》。此外《太上老君

① 参见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

② 晁载之：《续谈助》卷4，“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11册，第21页。

③ 崔玄山之所以被称作“崔元山”，据张保见推测“疑是避康熙帝讳改”（张保见：《乐史〈太平寰宇记〉的文献学价值与地位研究：以引书考索为中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恐不精确。《太平寰宇记》已经引作“崔元山《濂乡记》”（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一）卷12《河南道十二·亳州·真源县》，中华书局，2007年，第236页），中华书局影印的《宋本太平寰宇记》（乐史撰：《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这一部分内容已经不存，无法取证，如果确实与避讳问题有关的话，据称“宋人避讳之例最严”（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赵玄朗”作为宋代国讳，大约始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宋史》卷104《志第五十七·礼七》，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2541—2542页），晚于《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因此，两宋文献中“玄改为元，或为真”（陈垣：《史讳举例》，第112页），可能与宋代“赵玄朗”避讳有关。但也不必然如此，存在较多不避“玄”字的情况，不详是其初如此，还是后人回改，诸如下文所引南宋谢守灏的相关论著中，多数情况下基本不避“玄”字，对“老子”称“混元”，不称“玄元”，似乎是在避讳“玄”字，但是对崔玄山却比较复杂，存在不避讳的情况，亦存在称为“崔山”的情况，似乎可以理解为缺字避讳，而具体情形难以确证。清代避讳“玄”字，或改为“元”，或在书写时缺笔。诸如《四库全书》本南宋罗泌《路史》作（转下页注）

年谱要略》载“崔玄山《地理志》”<sup>①</sup>，属于谢守灏自注内容，仅此1处，而此书中引用崔玄山《濂乡记》2次。谢守灏《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两次提到“崔山《地理志》”：第一次称“崔山《地理志》”<sup>②</sup>，内容大致与《太上老君年谱要略》所载相同，亦见于《混元圣纪》卷1<sup>③</sup>，大致可以确定所谓“崔山《地理志》”即“崔玄山《地理志》”；第二次称“《崔山地理志》”<sup>④</sup>，行文与第一次略有区别，但是应当也是指崔玄山《地理志》，两次皆未引用其文。《混元圣纪》3次提及《地理志》，都未标明作者，除去上文提到的卷一所引，其余两处分别为卷1谢守灏自注<sup>⑤</sup>，所指不详；卷2称：“《地理志》云：属淮阳，王莽改曰赖陵”<sup>⑥</sup>，此条应当是节略引自《汉书·地理志》<sup>⑦</sup>，无涉《濂乡记》。而谢守灏很可能是将《濂乡记》视为“地理类”文献，因而称为《地理志》，亦未可知。从目前经见文献来看，后世学者引用最多的是《濂乡记》，未见引用“崔玄山《地理志》”之文。在隋唐以前的现存文献中，《濂乡记》一书未见引用；隋唐《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李善注多有引用，但是皆没有注明作者生平及著作年代；《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经籍志皆未著录此书；北宋初年编订《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对此书皆有引用，但亦未涉及作者生平及著作年代问题；郑樵《通志》著录“《濂乡记》一卷崔氏撰”<sup>⑧</sup>；尤袤《遂初堂书目》两次著录此书，地理类称“魏《濂乡记》”，道家类称“《濂乡记》”<sup>⑨</sup>；南宋以降学者对《濂乡记》多有引用。那么，《濂乡记》到底成书于何时？又是何时散佚？

第一，《濂乡记》的成书年代。《濂乡记》一书的成书年代下限应当较为明确，张保见根据唐代引用情况指出：“疑成书当不晚于隋唐之际”<sup>⑩</sup>，此说较为稳妥。《北堂书钞》始撰于大业初年，已经引用《濂乡记》，因此其成书年代下限大约应当在大业元年（605）以前。而较为复杂的问题乃是其成书的年代上限问题，学界分歧加大，多为推测之语。刘纬毅对于这一问题多有论列，刘氏所辑《濂乡记》，将其置于曹魏时期；《中国方志》一书则明确将其归入三国时期<sup>⑪</sup>；《乡村志略述（代序）》更是将《濂乡记》定性为三国曹魏时期诞生的“最早的一部乡志”<sup>⑫</sup>。

（接上页注<sup>③</sup>）“崔玄山”，“玄”字缺笔（罗泌：《路史》卷12《后纪三·禅通纪·炎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3册，第89页），后世文献引用或著录《濂乡记》时写作“崔元山”的几例，多集中于清代，看似与清代避讳有关，但是明修《万历续道藏》所收明人朱权的《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作“崔元山濂乡记”（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下《玉笈灵文章·宋理宗皇帝制化胡辩》，《中华道藏》，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8册，第738页），似是因袭旧文。这几例颇具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从“避讳”角度解释崔玄山名讳差异问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难以完全采信。因此，我们以唐代学者的引用情况为准，定其名讳为“崔玄山”。

① 谢守灏：《太上老君年谱要略》，《中华道藏》，第46册，第124页。

② 谢守灏：《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上，《中华道藏》，第46册，第129页。

③ 参见谢守灏：《混元圣纪》卷1，《中华道藏》，第46册，第17页。

④ 谢守灏：《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中，《中华道藏》，第46册，第137页。

⑤ 参见谢守灏：《混元圣纪》卷1，《中华道藏》，第46册，第21页。

⑥ 谢守灏：《混元圣纪》卷2，《中华道藏》，第46册，第40页。

⑦ 参见《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635—1636页。

⑧ 郑樵编撰：《通志》卷66《艺文略第四》，中华书局，1987年，第782页。

⑨ 尤袤：《遂初堂书目》，“丛书集成新编”，第2册，第6—7页。

⑩ 张保见：《乐史〈太平寰宇记〉的文献学价值与地位研究：以引书考索为中心》，第141页。

⑪ 参见刘纬毅：《中国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⑫ 刘纬毅：《乡村志略述（代序）》，祁明主编：《风和志》，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5页。

刘氏的主要依据可能是尤袤《遂初堂书目》，但是尤袤并未明确注明到底是曹魏、冉魏、北魏，因此，仅凭这一线索只是不能排除曹魏成书说，但是难以确证其成书年代就是曹魏。《中国方志通鉴》称“根据明清一些学者的辑佚和历代书目著录”，亦将其归入三国时期<sup>①</sup>；明清学者的辑佚成果笔者未见，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总目》载有“崔元山《濂乡记》，《重订本目录》第三册中载有“崔玄山《濂乡记》”<sup>②</sup>，但是具体内容不详。张昱称：“三国魏崔玄山之《濂乡记》尤为可贵”<sup>③</sup>，依据不详。张安东称安徽地区有“三国魏人崔玄山《濂乡记》”<sup>④</sup>，此说依据不详。丁培仁称：“南北朝前崔玄（或作崔玄山）撰。”<sup>⑤</sup>应当是指成书于南北朝前期，语义模糊，具体依据不详。辛年称：“北魏崔玄山《濂乡记》。”<sup>⑥</sup>刘屹认为：“崔氏为北朝著姓，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为‘魏《濂乡记》。’故崔玄山应当是北魏时人。”<sup>⑦</sup>从行文语气来看，应当是推测之辞，并未给出可靠证据。综合目前学界引用情况，对于《濂乡记》成书年代时间上限的分歧，主要源自尤袤《遂初堂书目》所载之“魏”，从而形成三国曹魏与北魏两说，基本都未涉及冉魏时期，但是，都未给出进一步的证据。这也恰可反证现存《濂乡记》遗文中年代信息并不明确。详细检讨古代文献对《濂乡记》的引用情况，我们还是发现了一点线索：“武帝太昌元年壬子，遣散骑常侍饶杰、侍御史邯郾亮重修亳州老君庙。见《濂乡记》。”<sup>⑧</sup>

谢守灏为南宋时人，这条引文不见于谢氏的《混元圣纪》《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亦不见于此前众书所引《濂乡记》之文。而所谓“武帝太昌元年壬子”，应当是指北魏孝武帝年号，即公元532年，如果这条引文可靠，那么《濂乡记》成书年代的时间上限应当在公元532年以后。但是文中所载饶杰、邯郾亮两人史籍失载，“亳州”之称却有迹可循。王天良认为“北周末年改南兖州置”<sup>⑨</sup>，并未指明具体时间，王仲荦认为“周宣帝改”<sup>⑩</sup>，亦未指明具体时间。《周书》刘雄本传称“宣政元年四月……赠亳州总管、七州诸军事、亳州刺史”<sup>⑪</sup>。据此而论亳州当在宣政元年（578）4月之前已经设置，而周武帝是宣政元年“六月丁酉，帝疾甚，还京。其夜，崩于乘舆”<sup>⑫</sup>。因此，亳州最晚应当是在北周武帝末年，公元578年设置。《元和郡县图志》亦称后魏复置南兖州，周武帝改为亳州。<sup>⑬</sup>但是据《周书》所载：“丁卯，以柱国、随国公杨坚为南兖州总管，上柱国。”<sup>⑭</sup>此为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十二月之事，至少说明建德六年依然为南兖州。而《周书·宣帝纪》称：“壬戌，以柱国、南兖州总管、随国公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sup>⑮</sup>

① 参见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通鉴》，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② 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第18、26页。

③ 张昱：《成玄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5页。

④ 张安东：《清代安徽地方志研究》，黄山书社，2012年，第44页。

⑤ 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巴蜀书社，2008年，第575页。

⑥ 辛年：《行走中原下》，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82页。

⑦ 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华书局，2005年，第318页。

⑧ 谢守灏：《太上老君年谱要略》，《中华道藏》，第46册，第126页。

⑨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776页。

⑩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全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683页。

⑪ 《周书》卷29《刘雄传》，中华书局，1971年标点本，第505页。

⑫ 《周书》卷6《帝纪第六·武帝下》，第106页。

⑬ 参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7《河南道三·亳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8册，第224页。

⑭ 《周书》卷6《帝纪第六·武帝下》，第105页。

⑮ 《周书》卷7《帝纪第七·宣帝》，第116页。

此事大约为宣政元年七月,《周书》的记载存在自相矛盾之处。《隋书》中关于隋文帝任“亳州总管”一事,已经不见“南兖州”之称,而其《地理志》所载谯郡建置称“后魏置南兖州。后周置总管府,后改曰亳州”<sup>①</sup>。其中并未涉及改置“亳州”的具体时间,《隋书》《周书》成书时间大致相当,但是所载不同,难以形成定论。而我们只能大致推断,亳州大约在578年前后设置,最晚当在入隋以前。而谢守灏的引文,若为原文引用,那么《濂乡记》的成书年代应当在578年之后;若是谢守灏转述,那么《濂乡记》的成书年代当在532年以后,两者之间相差40余年,而年代下限在605年以前。成书时间如此晚近,如何能够如此迅速进入隋朝官方藏书,而为虞世南引用。其中原因可能与隋文帝开皇年间接受牛弘建议,鼓励民间献书有关,另外据《隋书》《北史》所载亳州地区曾经假托老子为隋文帝代周造势,《濂乡记》这样一部记载老子神化事迹的作品受到重视当不意外,但是具体情形难以确考。

第二,《濂乡记》的散佚年代。刘纬毅认为《濂乡记》“约在北宋末年亡佚”<sup>②</sup>,张保见称“宋后无传”<sup>③</sup>,但是都没有展开论证。从《太平御览》的引文来看,有数条不见于唐代学者的引文,因此,大致可以断定北宋初年此书尚存,而南宋时期谢守灏曾引用过两条《濂乡记》的内容,其中一条已见引于上文,另一条为:“魏文帝黄初四年癸卯,帝亲诣苦县老子庙致祭,令有司重修庙宇。见崔玄山《濂乡记》。”<sup>④</sup>这条引文亦不见于此前学者所引《濂乡记》之文,亦可能存在。据《续高僧传》所载北周释僧勔之言称:

黄初三年下敕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未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sup>⑤</sup>

而洪适《隶续》收录“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时间为“黄初三年十月十五日”<sup>⑥</sup>。谢守灏此文可能亦非原文引用,但却为确定《濂乡记》的散佚时间提供了一个年代下限。据谢守灏《混元圣纪进表》所载绍熙二年(1191),陈傅良《混元圣纪序》载绍熙四年,《太上老君年谱要略》的成书年代应当与《混元圣纪》相当,由此推测至晚到南宋中期,《濂乡记》一书可能尚存。但是南宋中期以后,此书的流传情况便难以确考了。虽然不少文献依然引用《濂乡记》,但是大都没有超出《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文选》《太平御览》等书范围。因此,我们推断《濂乡记》一书的散佚时间下限应当在南宋中后期。

## 二 《濂乡记》佚文辑录考辨

隋唐至晚清约有几十种文献引用过《濂乡记》,但核心内容集中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少数几部文献中。刘纬毅曾经辑录约10条《濂乡记》佚文,皆

① 《隋书》卷30《志第二十五·地理中》,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836页。

② 刘纬毅:《乡村志略述(代序)》,第5页。

③ 张保见:《乐史〈太平寰宇记〉的文献学价值与地位研究:以引书考索为中心》,第141页。

④ 谢守灏:《太上老君年谱要略》,《中华道藏》,第46册,第126页下。

⑤ 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24《护法上·周新州愿果寺释僧勔传六》,中华书局,2014年,第924页。

⑥ 洪适:《隶续》卷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第779页。

是辑自《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三书，除此之外尚有部分内容未见辑录，偶有学者引用，亦未系统辑录。除去刘纬毅已经辑录的10条，其他数条如下：

复帐《濂乡记》注云：老子治堂，丹绋复帐。老君碧复帐，孔子青复帐也。<sup>①</sup>

《濂乡记》曰：老子大目。

《濂乡记》曰：老子方口。<sup>②</sup>

崔玄山《濂乡记》曰：“老子为十三圣师，养性得仙，各自有法。凡三十六，或以五行六甲陈，或以服食度骨筋，或以深巷大岩门，或以呼吸见丹田，或以流理还神丹，或以歔歛游天山，或以元阳长九分，或以恬澹存五官，或以清净飞凌云，或以三辰建斗回，或以三五竟复还，或以声闻处海滨，或以三黄居魄魂，或以太一行成均，或以六甲御六丁，或以祭祀致鬼神，或以吹响沉深泉，或以命门固灵根，或以乘璇玑得玉泉，或以专守升于天，或以混沌留吾年，或以把握知塞门，或以太一柱英氛，或以虚无断精神，或以黄庭乘僮人，或以柱天德神仙，或以玉衡上柱天，或以六甲游玄门，或以道引俯仰伸，或以寂寞在人间，或以药石上腾云，或以九道致红泉，或以厥阴三毛间，或以去欲但存神。”<sup>③</sup>

《濂乡记》：李母碑曰：老子足蹈二五。<sup>④</sup>

《濂乡记》曰：老子为人，黄色美眉。<sup>⑤</sup>

《濂乡记》曰：老子祠堂北，有石榴二株。<sup>⑥</sup>

鹤山崔元《濂乡记》云：老子应见，代代有之。<sup>⑦</sup>

以上总共8条，再加上《太上老君年谱要略》中2条，总共10条，加上刘纬毅所辑10条，目前所见《濂乡记》遗文总共约20条。

另外尚有4处内容，仅能根据行文推测大意，但具体内容不详：一为张冲虚《上枯桧再生表》亦曾引用《濂乡记》：“谨按濂乡记，此树枯来，莫知年代。”<sup>⑧</sup>似为转述大意，并非原文引用。二为据唐代编订的《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称：

《高上老子本纪》《玄中记》《濂乡记》《神仙传》《出塞记》并云，老子为十二帝师；

① 虞世南撰：《北堂书钞》卷132《服饰部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66页。

② 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17《人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14，315页。

③ 徐坚等著：《初学记》卷23《道释部》，中华书局，1962年，第549—550页。细数只有34法，似有遗漏，后世学者引用此文或有节略，或存在个别文字差异，但是并不怀疑此文出自《濂乡记》。而综合目前所见比较可靠的20条《濂乡记》遗文，大约总计623字，此处“三十六”条内容大约238字，占比约38%，可能在字数上不太均衡。但是，诸书引用《濂乡记》大都是节略引用，各取所需，因此，《濂乡记》原书字数应当不止600余字，结合下文所论其他3条尚难确定具体内容的引文，特别是涉及历代为“圣师”的内容，大约至少有200余字的篇幅，因此，《濂乡记》的篇幅至少应当在800字以上。比对南北朝时期同类性质文献的篇幅与内容结构，特别是北宋之前学者引用葛洪《神仙传》中老子传记的相关条目，篇幅大约亦在500字以上，因此，综合来看，此条的篇幅问题并不突兀，应当大致可信。

④ 李昉编纂，夏剑钦点校：《太平御览》（2版）卷372《人事部十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

⑤ 李昉编纂，夏剑钦点校：《太平御览》（2版）卷388《人事部二十九》，第248页。

⑥ 李昉编纂，夏剑钦点校：《太平御览》（2版）卷970《果部七》，第773页。

⑦ 谢守灏：《混元圣纪》卷1，《中华道藏》，第46册，第19页。

⑧ 董诰等编：《全唐文》（全11册）卷928《张冲虚》，中华书局，1983年，第9674页。

或云为十三圣师。伏牺时出为师，号郁华子；神农时出为师，号大成子；祝融时出为师，号广成子；苍颉时出为师，号黑精子；帝喾时出为师，号赤精子；黄帝时出为师，号力牧子，又称大成子；帝尧时出为师，号务成子；帝舜时出为师，号尹寿子；夏禹时出为师，号季胥子；汤时出为师，号锡寿子；文王时出为师，号鬻鬻子，为守藏史；武王时出为师，号育成子；成王时出为师，号经成子；康王时出为师，号郭叔子；昭王时遂退官，西化胡；孔子时出以为师，号曰老子。<sup>①</sup>

以上内容涉及老子16次化现，其中13次为帝王师，2次为仓颉、孔子师，1次为化胡之事。《初学记》所引《濂乡记》之文涉及“十三圣师”之说，因此，此处引文或许部分为《濂乡记》的内容。而谢守灏曾多次提及崔玄山《地理志》，主要涉及老子为“圣师”相关内容，但是没有原文引用，结合此文推测，或许谢守灏所称崔玄山《地理志》就是指《濂乡记》，所谓“地理志”是就此书性质而言，并非书名。三为《混元圣纪》称：“《帝系谱》《中经》《出塞记》《濂乡记》以伏牺、神农、祝融为三皇。”<sup>②</sup>由此推测，《濂乡记》中似乎存在涉及“三皇”的相关内容。四为明人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著录《宋理宗皇帝御制化胡辩》，文后附有考辨性质文字称：

余谓其化胡之事不可凭道释二家之书，当以儒典证之，则知何人为之立教，为何人所化也。其事见于《括地志·四夷部》、《魏略·西戎传》、《隋史·西域传》、裴楷《上汉桓帝疏》及所注《三国志》、崔元山《濂乡记》皇甫谧、嵇康等传。<sup>③</sup>

由此推测《濂乡记》应当涉及老子化胡之事，但是朱权的考语是因袭旧文，还是确有依据，目前难以确定。明代以前及以后的《濂乡记》遗文中，皆未涉及老子化胡之事。仅上文所引《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提及老子化胡之事，但是尚且不能明确确定是否为《濂乡记》的原文，不管朱权的考语是否与此有关，因其并未引用原文，具体情况难以确考，所以暂且将其合并为一条。

综上所述，《濂乡记》尚存遗文23条，其中20条类似原文，见引于不同文献，多有异文；关于“十三圣师”的1条，是否原文难以确定；其余2条仅知大意，具体内容不详。另有2条疑似遗文<sup>④</sup>，但是证据不够充分，我们暂且存疑。

① 史重玄等编撰：《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中华道藏》，第5册，第608页。

② 谢守灏：《混元圣纪》卷1，《中华道藏》，第46册，第15页。

③ 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下《玉笈灵文章·宋理宗皇帝御制化胡辩》，《中华道藏》，第28册，第738页。

④ 《医心方》中有一条引文涉及老子相：“《颡卿记》曰：老君足下有八卦文，眉长，耳有三门，鼻有双柱，厚唇，口方，色黄，是贤智相也。”（〔日〕丹波康赖：《医心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第544页）引文中“颡卿”二字，及旁边小字注文，颇难辨识，据相关学者点校成果，“颡”字旁边的注文为：“赖欬。宇治本并医本作‘颡’字。”（〔日〕丹波康赖撰，翟双庆、张瑞贤校注：《医心方》卷24《相男子形色吉凶法第廿六》，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396页）因此，此文亦有可能是出自《濂乡记》，但是略有省略，难以确定。宋晁说之称“老子始下生来，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为人黄色美眉，长耳广颡，大目疏齿，方口厚唇，耳有三门，鼻有双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晁载之：《续谈助》卷4，第21页）文中所言“长耳广颡”“疏齿”“手把十文”，不见于他书所引《濂乡记》，极有可能也是《濂乡记》之文，但是其他文字内容与他书所引《濂乡记》略有差异，加之作者将《濂乡记》的作者注作“顾玄仙”，因此，此条我们不单列为一条，而是作为存疑的条目。

### 三 《濂乡记》的史料史价值

就目前所见《濂乡记》遗文内容来看，主要内容是关于老子，因此，研究汉魏六朝道教史的学者多有引用，而其中关系较大的当属“李母碑”与《老子铭》问题。

第一，“李母碑”可能有数种，并非皆与《濂乡记》所载有关。

1. “李母冢碑”。酈道元称：

又北，澗水之侧，又有李母庙案李下近刻衍老字，庙在老子庙北，庙前有李母冢。冢东有碑，是永兴元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于曲、澗间。<sup>①</sup>

酈道元似乎并没有明确著录该碑标题，因此我们仅能根据其表述确定此碑的位置在庙前“冢东”，酈道元所引用的这一句碑文，并不见于《濂乡记》所录《李母碑》《老子母碑》《老子圣母李夫人碑》，直到洪适《隶释》著录《李母冢碑》<sup>②</sup>，所据乃是酈道元的《水经注》，此碑才有了正式名称，是否与原碑标题则难以确考，明人杨慎《水经注所载碑目》<sup>③</sup>、陈桥驿《水经注·金石录》<sup>④</sup>等皆称“李母冢碑”。此碑的年代难以确考，东汉时期的王阜乃是蜀郡人，其生活年代与永兴元年难以匹配，刘屹已经有所辨别<sup>⑤</sup>，此处不再展开。

2. 崔玄山《濂乡记》所载“李母碑”。崔氏所载可能有两碑，抑或三碑，位置大约与酈道元所载“李母冢碑”不同。首先，《老子母碑》，首次见引于《北堂书钞》：

玉简编以黄金《濂乡记》云：《老子母碑》曰：老子把持仙录，玉简黄金字，编以白银，记善报恶。<sup>⑥</sup>

李善注《文选》<sup>⑦</sup>、《太平御览》<sup>⑧</sup>的引文与此大致相同，文字略有出入。此碑所立位置不明，是否与酈道元所见《李母冢碑》为同一碑，亦未可知。其次，《老子圣母李夫人碑》，首次见引于《太平御览》：

崔玄山《濂乡记》曰：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二里，祠门左有碑，文曰：“老子圣母李夫人碑。”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鹿下，托于李氏胞中，七十二年产于楚国淮阳苦县濂乡曲仁里。老子名耳，星精也，字伯阳，号曰聃。<sup>⑨</sup>

① 参见酈道元：《水经注》卷23《阴沟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3册，第358页。

② 参见洪适：《隶释》卷20《李母冢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第659页。

③ 参见杨慎：《水经注所载碑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史部，第278册，第43页。

④ 参见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3页。

⑤ 参见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华书局，2005年，第307页。

⑥ 虞世南撰，陈禹谟补注：《北堂书钞》卷104《艺文部·简四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9册，第511页。

⑦ 参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56《铭·新刻漏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29页。

⑧ 参见李昉编纂，夏剑钦点校：《太平御览》（2版）卷606《文部二十二》，第762页。

⑨ 李昉编纂，夏剑钦点校：《太平御览》（2版）卷361《人事部二》，第14页。



“老子圣母李夫人碑”可能就是该碑标题，后面文字当为碑文内容，而“始起乘白鹿下，托于李氏胞中”一句与《李母碑》有关：

《濂乡记》曰：老子乘白鹿，下托于李母也。<sup>①</sup>

崔玄山《濂乡记·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托于李母也。<sup>②</sup>

《濂乡记·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托于李母。<sup>③</sup>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老子圣母李夫人碑”为《濂乡记》所引用，与《濂乡记》所引《李母碑》很可能就是同一碑，位置在李母祠之“祠门左”。再次，《圣母碑》，此碑名首次见录于《太平寰宇记》：“李母祠。《濂乡记》：‘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三里。祠门内右有圣母碑，东院内有九井。’”<sup>④</sup>此“圣母碑”，标题与内容亦不详，位置在李母祠“祠门内右”，与上文所引“祠门左”之碑可能不同，但是熊会贞可能认为是同一碑。<sup>⑤</sup>而据《太平寰宇记》同篇所载：“李母坟，在县东十三里。《水经注》云：‘老子宫前有李母坟，东有碑，汉桓帝永兴元年谯县令长沙王阜所建。’”<sup>⑥</sup>

此处引用《水经注》之文有所出入，明确了“汉桓帝永兴元年”。但是，至少可以据之确定《太平寰宇记》所载李母祠“圣母碑”与酈道元所载“李母冢碑”应当不是同一碑。而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卷5收录“汉李母庙碑”，所据乃是《水经注》之文，显然是将“李母冢碑”与“李母庙碑”视为一碑看待，其后的考证文字先是叙述了李母遗闻，随后引据《太平寰宇记》《文选》之文，概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对《濂乡记》多有引用。从施氏的行文来看，是将《太平寰宇记》所载“圣母碑”，《文选》所引《濂乡记》所载“老子母碑”，《太平御览》所引《濂乡记》所录《李母碑》《老子圣母李夫人碑》及王阜《老子圣母碑》，混为一碑看待。随后称：“碑题《孝文圣母李夫人碑》。此盖魏晋间方士所立，在祠内之碑，非酈道元所见冢东之汉碑也。”<sup>⑦</sup>《孝文圣母李夫人碑》具体内容已经难以确考，施氏所称碑题亦未注明出处，不详是否确有依据。而据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所载：

《濂乡记》卷亡崔元山撰不著录

《文选》新刻漏注：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篆，玉简金字，以白银纪掇善恶。《北堂书钞》艺文部同此引崔元山《濂乡记》，《艺文类聚》诸书所引皆记老子事，其母碑文称《孝文圣母李夫人碑》《类聚》兽部，又《御览》人事部<sup>⑧</sup>

韩富荣曾全文引用此文，未加辩证<sup>⑨</sup>；屈守元亦曾征引章氏此文，但是对于章氏所言“其母碑文

①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95《兽部下》，第1648—1649页。

② 徐坚等著：《初学记》卷29《兽部》，第715页。

③ 李昉编纂，夏剑钦点校：《太平御览》（2版）卷906《兽部十八》，第252页。

④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一）卷12《河南道十二·亳州·真源县》，第237页。

⑤ 参见杨守敬、熊会贞：《杨熊会撰水经注疏》11，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第2837页。

⑥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一）卷12《河南道十二·亳州·真源县》，第237页。

⑦ 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2页。

⑧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6《地理》，《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1936年，第4册，第4993页。

⑨ 参见栾星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河南方志总目》，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9页。



称孝文圣母李夫人碑”持怀疑态度，称“此不知何据”<sup>①</sup>。因此，对于施蛰存所称“碑题《孝文圣母李夫人碑》”，我们暂且存疑。此外尚有唐代《老子圣母碑》；宋朱长文录有“唐亳州老子圣母碑吕献臣隶”<sup>②</sup>；赵明诚录有“第一千八十唐老子圣母碑李昇卿撰吕献诚八分书开元二十二年九月”<sup>③</sup>；郑樵《通志》称“老子圣母碑吕献臣分书亳州”<sup>④</sup>。据施蛰存所考，此碑亦亡。<sup>⑤</sup>王阜《老子圣母碑》：“王阜《老子圣母碑》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sup>⑥</sup>此碑与《太平御览》所引《濂乡记》所载《老子圣母李夫人碑》，除去“老子者，道”这4字之外，其余内容基本不同，很可能是两个系统的老子诞生神化传说；亦与《濂乡记》所载《李母碑》《老子母碑》的内容没有交叉。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太平御览》此处所引“王阜《老子圣母碑》”很可能是另一碑，与《濂乡记》的关系并不紧密。至于此碑与酈道元所载“李母冢碑”是何关系，仍然有待详考。

第二，《老子铭》。北宋以前的文献中未见《老子铭》之称，南宋以后学术界逐渐将《老子铭》视为汉代边韶所撰，承袭至今学界几乎没有异议。北宋道士贾善翔曾经引用边韶所撰《圣母碑》：“故边韶作《圣母碑》云：於惟真德，抱虚守清。乐居下位，禄势不营是也。”<sup>⑦</sup>此文不见于《濂乡记》，根据引文内容判断，可能是出自《老子铭》，但是，贾善翔作为当时高道，亲自到过亳州太清宫，为何会出现这一问题实在令人费解。目前通行的《老子铭》乃是今本《隶释》所录，大约797字，其中阙文6字，实存791字，与《隶续》所录碑式的文字存在差别：“老子铭，篆额一行，黑字，文二十一行，行四十一字，皇上字平阙。”<sup>⑧</sup>根据碑式所载，碑字数应当为861字，洪适的记载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另据酈道元《水经注》所载：

穀水自此东入澗水，澗水又北迆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案中官近刻作官臣，命陈相边韶撰文案近刻脱文字。碑北有双石阙，甚整顿。石阙南侧，魏文帝黄初三年，经谯所勒；阙北东侧，有孔子庙，庙前有一碑，西面，是陈相鲁国孔畴建和三年立……边韶《老子碑》文云案文近刻讹作又：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在赖乡之东案赖下近刻衍游字，澗水处其阳。<sup>⑨</sup>

据此而言老子庙前有2碑，根据文意推测，至少有一碑应当是陈相边韶撰写的“老子碑”，但“老子碑”是否就是该碑标题不详。酈道元引用边韶“老子碑”是实地考察而有此论，还是因袭旧说亦无从详考。入隋以后，“开皇六年，文帝敕内史舍人薛道衡立碑修庙”<sup>⑩</sup>。薛道衡《老子庙碑》称：“赖乡旧里，涡川遗迹。古往今来，时移世易。灵庙凋毁，祠坛虚寂。九井生桐，双

① 屈守元：《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3年，第375页。

② 朱长文：《墨池编》卷6《唐道家碑三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第891页。

③ 赵明诚：《金石录》卷6《目录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第191页。

④ 郑樵编撰：《通志》卷73《金石略第一》，第846页下。

⑤ 参见施蛰存：《水经注碑录》，第212页。

⑥ 李昉编纂，夏剑钦点校：《太平御览》（2版）卷1《天部一》，第4页。

⑦ 贾善翔：《犹龙传》卷2《为帝师》，《中华道藏》，第45册，第596页。

⑧ 洪适：《隶续》卷7《碑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第807页。

⑨ 酈道元：《水经注》卷23《阴沟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3册，第357—358页。

⑩ 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卷3《释御疏序上》，《中华道藏》，第9册，第577页。

碑碎石。”<sup>①</sup>另据元薛致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科文疏》卷5所载：“历代修崇，皆有碑记，故汉有蔡邕碑、边韶碑，隋有薛道衡碑，唐碑已讹缺不完，莫详孰氏所撰。昔王希夷有诗云双阙已讹唐故事，残碑犹有汉文章是也。”<sup>②</sup>

“边韶”应是“边韶”之误，王希夷为唐前期人，薛道衡距郗道元的年代不远，据二人所言，老子庙前双碑应当在入隋以前就已经是“残碑”，因此，不管是碑身破碎，还是碑文字迹漫漶难以识别，后人皆难以依据原碑获得完整的碑文拓片。而唐初边韶文集已经散佚，因此，追寻其所撰老子碑全文亦成为一大难点。《老子铭》之称不见于北宋以前传世文献，而其拓片应当是北宋前期流传于世，首次提及“边韶《老子铭》”的可能是北宋前期的周越，据赵明诚《金石录》所引周越《书苑》称：“本朝周越《书苑》遂以为韶撰文，而邕书。”<sup>③</sup>洪适亦称：“其它杂书，至刘熊王建诗老子周越法书苑……等碑，皆云蔡中郎所书。”<sup>④</sup>周越生卒年大约为988—1048年。<sup>⑤</sup>其说可能渊源有自，只是周越《书苑》已经散佚，难以确考。而稍后于周越的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亦曾提及《老子铭》，《集古录》的成书年代颇为复杂暂且不论，我们此处主要就《老子铭》相关内容展开论述：

后汉老子铭 岁月见本文

右汉老子铭，按桓帝本纪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至十一月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而此碑云八月梦见老子而祠之。世言碑铭蔡邕作，今检邕集无此文，皆不可知也。右真迹<sup>⑥</sup>

今本《集古录跋尾》所载与此大致相同，只是“岁月见本文”作“延熹八年元第一百六十一”<sup>⑦</sup>。从行文来看，欧阳修应当浏览过碑文内容，但是所据拓片来源不明。根据洪适所收《老子铭》之文，其中一句与《濂乡记》所载基本雷同：“学礼于老聃，计其年纪，聃时以二百余岁，聃然老旄之貌也。”<sup>⑧</sup>《濂乡记》曰：“老聃计其年纪，时已一百余，聃无老耄之貌也。”<sup>⑨</sup>

《濂乡记》的史料来源极为复杂，《老子铭》此条文字的来源亦不明确，这段文字目前仅见于这两种文献之中，如果确系引自《濂乡记》，那么，《濂乡记》至少提供了《老子铭》的年代上限，成为《老子铭》断代的重要旁证之一。

## 结 语

崔玄山《濂乡记》1卷，大约撰于北魏太昌元年或北周宣政元年以后，隋大业初年以前，亡佚于南宋中后期。是书可能是采掇旧文连缀而成，原貌已经难以窥见，就目前所见内容，绝大部分能够在魏晋南北朝的典籍中找到近似的表述，对于研究六朝老子神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① 焦竑著，黄曙辉点校：《老子翼》，“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

② 薛致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科文疏》卷5，《中华道藏》，第10册，第505页。

③ 赵明诚：《金石录》卷15《跋尾五·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第263页。

④ 洪适：《隶续》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第783页。

⑤ 参见张典友：《周越生平新考》，《中国书法》2012年第1期。

⑥ 欧阳修：《集古录》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第24页。

⑦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2，“丛书集成续编”，第96册，第646页。

⑧ 洪适：《隶释》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第472页。

⑨ 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18《人部二》，第341页。

值。崔玄山的生活年代与酈道元相近，但是《濂乡记》所载“李母碑”与《水经注》所载“李母冢碑”缺乏直接关系。而后世学者研究汉代老子神化问题，经常引用的《太平御览》卷1所录“王阜《老子圣母碑》”，与《濂乡记》所录“李母碑”亦缺乏直接关系，《太平御览》的编纂者并未将两者混同。因此，在目前所见史料范围内，引据“王阜《老子圣母碑》”探讨汉代老子神化问题，所面对的问题乃是王阜其人生平事迹的确定，酈道元《水经注》所录“李母冢碑”文与“王阜《老子圣母碑》”是否是同一碑等问题。《濂乡记》所载“李母碑”，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参考价值并不突出。而《老子铭》的作者、年代亦扑朔迷离，《濂乡记》对于《老子铭》的断代问题或有帮助。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 《螺蛳壳中的曼陀罗：古籍影印蠡探》出版

2020年3月，《螺蛳壳中的曼陀罗：古籍影印蠡探》一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全书20余万字，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南江涛从业多年的经验文字积累。

书中收录作者多年来陆续发表的古籍影印相关文章30余篇，集中反映我国1949年以来古籍影印出版领域的状况、问题以及作者的思考和方案。文章分为三组：一蠡探编，主要是对我国古籍影印丛书出版史和出版理论的探索；二履冰编，是编辑古籍图书时撰写的出版说明、编辑手记等具体感悟，具体而有可操作性；三研酌编，是作者在编辑工作中对所见具体古籍对象的研究和部分书评文字，是对古籍影印图书的进一步研究。

影印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影印古籍忠实于文献原貌，使文献的真实性、完整性、原生态性得到高效、充分的揭示，并且有可操作性强和速度快的优势，对整理出版传统文化典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的最好方式之一。100多年来，影印的制作和呈现理念在不断发展进步。可以说，好的古籍影印出版物是对传统文化典籍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再现和传承，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人们常说古籍影印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但再专业的书，只要有价值，总需要有人去做。作为古籍的整理、传承、保护者，应当从不同层次发掘“古籍之美”，引领读者亲近古籍善本，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真正激活古籍和传统文化在广大读者中的生命力。在当下如火如荼的古籍影印出版中，包含相当数量的旧志影印与地方丛书编纂项目，其质量却因为种种原因显得参差不齐，需要引起相关部门和出版社重视。本书的出版，对古籍影印工作具有一定启发意义。